

◆“历史上的繁星”系列之四十六

再探西汉梁国太傅贾谊 (九)

■采访对象:孙纲

中国范仲淹研究会一、二届理事,河南省范仲淹研究会理事,杭州范仲淹文化网顾问,商丘炎黄研究会理事,商丘范仲淹研究会副会长。

■晚报首席记者 贾若晨

●● 最愿双剑合璧

明代嘉靖版《归德府志》中,“名宦”第一人就是贾谊。可见在历史中,商丘人对贾谊也是非常有感情的。只是到了清代以后,商丘人对贾谊开始有了疏忽。

为了让贾谊重回商丘,2015年1月至4月,我创办了“商丘贾谊纪念馆”。纪念馆的地址在中环广场地下一层,展示面积400平方米,里边陈设了大量我整理的资料。之所以后来没有坚持下去,一方面是因为房屋租金太高,我个人承担不起;另一方面是因为房屋在地下一层,环境比较潮湿,我身体吃不消。

商丘市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田启义先生对纪念馆有这样的题词:“重启梁园文化,再兴大汉雄风。”这正中我的情怀。

重启梁园文化,让贾谊回归梁园是我的夙愿。试想一下,如果梁园有《过秦论》作者贾谊的支撑,梁园有以贾谊为古文化品牌;睢阳区有应天书院和《岳阳楼记》作者范仲淹的支撑,睢阳区以应天书院为古文化品牌,这将是商丘人文多么美好的未来。

贾谊与范仲淹,可谓大家。大汉王朝的历史虽已结束两千多年,但他的精髓“汉朝之儒,唯贾生而已”(刘歆)还在;北宋虽已逝去千年,“宋亡,范公终不亡耳!范公何尝死也?”(李贽)。

两人在历史上功绩卓著,影响深远,德行无疵,褒奖甚众,史料丰富。商丘如以此两人作为历史文化的一个基点,再去招引国学文化、古都文化、古城文化、先商文化等会顺畅许多。更值得期盼的是,两位大家扎根商丘,必然给我们的后世子孙带来文化上更加浓厚的熏陶,假以时日,商丘必然人才济济。

就我个人而言,我也希望能得到各方的帮助,将“商丘贾谊纪念馆”继续办下去,为大家了解、认识贾谊提高一个平台。我想,恢复这贾谊和范仲淹的文化经典,使他们在商丘双剑合璧,会给商丘带来巨大的收获。

■阅读提示

公元前168年,33岁的贾谊在忧郁中死去。他身后,留下了至今看来仍有意义的治国理念和“西汉鸿文”,留下了长达两千年的争论——贾谊的遭遇该如何看待?有人说他已经才尽其用,有人说是汉文帝不能尽其才,有人说是贾谊自己气量太小……但无论如何,没有人能否定他的才华,没有人能否定他的远见。孙纲说,贾谊将是商丘在范仲淹之外的另一个文化品牌。

●● “遇”还是“不遇”

中国人爱说“盖棺定论”,人死了总要给这个人的一生作出个准确的评价。贾谊身后,在不同历史时期,不同身份的历史人物作出了众多的评价。这些评价各有侧重,却有一点不曾改变——没有谁去怀疑贾谊的才华。

前人给予贾谊的评价很多,重点都集中在贾谊“遇”还是“不遇”的问题上,也就是汉文帝对贾谊是否足够重用。《汉书·贾谊传》这样写:“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,谊之所陈略施行矣。”这是认为,贾谊提出的政治理论及具体主张得到了汉文帝的响应和施行。因此,班固认为“谊亦天年早终,虽不至公卿,未为不遇也”。

《贾生》一诗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创作的。在诗中,王安石透露出了与班固类似的观点。我们看这首诗:“一时谋议略施行,谁道君王薄

贾生?爵位自高言尽废,古来何啻万公卿。”诗中采用了两个反诘句。第一个反诘句,意为:贾谊所献的“谋议”,大体上都能获得施行,谁能说文帝轻视贾谊呢?第二个反诘句,意为: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达官贵人,尽管他们的官爵职位很高,但其言论都被君王废弃了。弦外之音是贾谊比那些达官贵人更为幸运。

历史中,认为贾谊一生“不遇”的人也不少,但对贾谊“才不尽用”原因的认知却不尽相同。如李商隐那首著名的七绝《贾生》:“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,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强调贾谊无与伦比的才华,把“不能用人”的责任落在了文帝身上。

苏轼对贾谊的“不遇”另有看法。他那著名的《贾谊论》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:贾

谊没有“尽用其才”的原因在于自身气量的狭小。他认为贾谊最大的问题在于不能“忍”与不善“处穷”。他还为贾谊写了个评语:“贾生志大而量小,才有余而识不足。”

欧阳修所写的《贾谊不至公卿论》,把贾谊“不遇”的原因总结为“孝文之初立日浅,而宿将老臣方握其事”,并认为这些老臣“朴而少文,昧于大体”。总结下来,欧阳修认为汉文帝当时自身处境不佳,而老臣、功臣们缺乏必要的政治远见与政治素质,排斥贾谊,这导致汉文帝无法重用贾谊。

贾谊的为人处事也成为一个问题。有观点认为他在处理与同僚关系上不够成熟,跟自己的同僚对立,与自己的老师张苍存在严重分歧,与文帝的宠臣邓通为敌。贾谊把所有人都得罪了,也就只能“不遇”了。

他要承担比别人更多的忧患。任继愈先生在探讨贾谊悲剧原因时这样论述:贾谊命运的悲剧具有一种时代的意义,当时,汉朝统治面临着战略转变。在这种情况下,个别天才人物是无能为力的,贾谊看到了转变的必要,但没有看到转变的时机尚未成熟,这是他悲剧的内在原因。”

从时机上来看,汉文帝“虽极赏贾谊,然其时内则功臣元老,外则诸王长亲,尚非汉廷大有为之时”。从统治集团的格局来看,其成员大多是武将出身,武夫大都对儒生非常不屑。对于儒家繁复的礼仪,他们也是不感兴趣,甚至厌烦。从问题的积淀上来看,在经济问题上,贾谊认识到商业发展对农业的

●● 他有点穿越了

现在很多人回看历史,总感觉一些历史人物是从之后的历史时期穿越回去的,因为他们的思想、眼光、能力实在大大超过了他们所处的时代,实在是太过超前。我们现在回过头再去看看贾谊,也会有一种他穿越了的超前感。

贾谊的才华已经超越了同时代的人,因此他注定了

28 高姓与商丘历史文化(3)

李白、杜甫、高适在商丘交流了两个月,因杜甫回洛阳巩县为祖母奔丧,李白要去江南,三人便在商丘分手。这段日子给杜甫、李白、高适三人都留下美好的回忆,以至于多年以后,三人还通信互赠诗篇,重叙友情,经久难忘。

高适在宋州10年,才当了参军这样一个够不上品级的小官。他渴望有像西汉时期的梁孝王那样广招贤才的明主,但“君王不可见”,“昔贤不复有”。他也多次攀附权贵,希望他们推荐自己,使自己得到提拔重用。给宋州的韦参军、李太守等人写了许多应酬之作,而自己终究是“暮宿灵台私自怜”。

28岁的高适北游燕赵,先后欲投朔方节度副大使信安王祚、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幕府。由于不如意,35岁返回宋中(商丘)。作《燕歌行》。自此时至天宝七载(748年),一直居于宋中。其间曾游魏郡、楚地等,又曾旅居东平等地。

唐玄宗天宝八年(749年),高适46岁。为睢阳太守张九皋所荐举,应有道科,中第,授封丘尉(一般武官);52岁拜左拾遗,转监察御史,佐哥舒翰守潼关。

唐肃宗至德二年(757年),安禄山叛军

连载

商丘姓氏探秘

■刘秀森

攻陷潼关。高适随玄宗至成都;八月,擢谏议大夫。十一月,永王璘谋反。十二月,以高适为淮南节度使,讨伐永王璘。至德三年,54岁的他讨平永王后,又受命参与讨安史叛军,曾救睢阳之围。

高适62岁正月卒。赠礼部尚书。留有《高常侍集》等传世。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说:“有唐以来,诗人之达者,唯适而已。”

高适在唐代文学史上,是地位仅次于杜甫、李白的大诗人。睢阳丰富的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积淀,给了高适深厚的文化营养,使他在诗歌创作上通向成功之路,流传百世。他写下与睢阳有关的诗篇有69首之多。

唐朝之后,北宋时期,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是水路交通的命脉,流经汴、商。

大运河在商丘的码头是沿途规模很大且很繁华的码头,紧挨商丘城。自公元955年至1127年百余年中,商丘繁盛仅次于汴京。



都尉高怀德以节制睢阳岁久。性颇奢靡,而洞晓音律,故声伎之妙,冠于当时。法部中精绝者,殆不过之。宋城南抵汴渠五里,有东西二桥,舟车交会,民居繁伙,倡优杂户,厥类亦众。然率多鄙里,为高之伶人所轻诮,每宴欢乐,必效其朴野之态,以为戏玩,谓之“河市乐”。

宋朝王巩《闻见录》记:“南京(宋朝商丘称南京)汴河五里(今商丘古城南关外叶园有古运河码头遗址),河次为之河市。五代国初,官府罕至,舟车所聚,四方商贾孔道也。其盛非宋州比,凡郡有宴设,必召河市乐人,故至今俳优曰河市乐人者,由此也。”

当时高怀德家班是为高家等贵族服务的,他们的演出水平“法部精绝者,殆不过之”,是所谓的雅乐;而河市乐是为平民服务的“率多鄙里”。

“凡郡有宴设,必召河市乐人”,“为高之伶人所轻诮”。高家班看不起“河市乐人”,认为是“散乐”;“在处临河者皆曰河市……艺人于市肆作场谓之打野……”(见宋章渊《稿简赘笔》)。

宋朝时商丘的歌舞戏剧繁荣,高怀德有很大功劳。高姓为商丘的历史文化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(67)

当时,商丘文化繁荣,尤其在戏曲和歌舞文化方面,本地与外地交融成风景。王仲勇《南都赋》写到商丘城边雁池的情景时有如此的描写:“绿净漪涟,秋浪张雨,春波拍天。鹤州背其后,鳧渚面其前。棹女讴而荡桨,渔人急而叩弦。”当写到设宴于平台时又道:“触缥玉之醅,吹紫凤之箫,击灵鼙之鼓,聆辽滇之歌,睇巴渝之舞。又有那邯郸曼姬,燕代丽女,轻祛靓装,弹幼媚妩,阴眸微睨,色授神予。于是众宾皆醉,颓然忘归。浩歌起舞,献寿考无疆之颂。”可见当时商丘歌舞戏艺的昌华繁盛。

当时在宋州(商丘)最有影响的乐舞戏艺班社有二:一是以汴河河市为背景的民间乐班“河市乐”,二是时任归德军节度使的赵匡胤的妹夫高怀德的家班。与高怀德同时代的应天知府王曾(字孝先)在《王文正笔录》中记述当时这两个班社的情况说:“附马